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特别报道

编者按

战争的胜负从根本上说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实力的较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我国国力极为孱弱、工业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势下展开的,由此注定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回顾 70 年前烽火连天的难忘岁月,几亿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力克难关坚持生产支持抗战,尤其诸如在交通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的沦陷区工商业战略大转移,大后方的军工企业冒着敌机轰炸为前线将士赶制被服用品等装备,藏匿山中的工厂夜以继日不停运转力求多生产武器弹药,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丰衣足食……这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动人情景,不但直接服务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且书写出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壮丽诗篇,在极其艰难的战时环境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为了时至今日我国人民尤其是企业和企业家们理当继承与弘扬的一笔重要的物质财富、精神资源与道义力量。

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狭窄的防空洞内灯火通明,一批批抢弹从这些地下兵工厂生产出来运往前线……正是这些从沦陷区转移来的工业机器设备,为打败日寇奠定了基础。

周凯 张琴 王晓磊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1938 年 10 月发生在宜昌的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则是其中一场可歌可泣的战斗。而指挥这场战斗,创造这个川江运输奇迹的,则是时年 45 岁的民营企业家卢作孚。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宜昌危在旦夕。此时的宜昌像个大仓库,成千上万的难民、师生、军政要员以及大批工业机器设备拥塞于此。当时工业相对发达的华东、华南大片地区已被日军占领,如何将这些人员和机器尽快运往大后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保存,关系到能否与日军打持久战,情况十分危急!

国民政府海军与日军海军实力相差悬殊,抗战初期,为数不多的军舰除了被日军击沉外,多数为阻止日海军沿江而上自沉,此时海军已无运力可言。危急时刻,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创办人卢作孚挺身而出,一向不肯做官的他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指挥宜昌大撤退。卢作孚曾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他电告全体员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介绍,当时宜昌大撤退面临重重困难。需要民生公司转移的有来自长江上游和华东、华北、华南的各种物资,运输量超过 9 万吨,而以当时民生公司 20 余艘船的运力,要将他们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更为严重的是,40 天后川江将接近枯水期,大型轮船无法通行,几乎所有人都想象不出如何能在 40 天内完成大撤退。

刘重来教授介绍,卢作孚根据民生公司在枯水时期创造的“三段航行法”,采取分段运输,并对船只航行的时间和物资装卸的办法做了具体安排,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撤退。

1938 年 10 月 24 日,宜昌撤退大幕就此拉开。24 只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除了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

长江上游,滩险流急,为了争取时间,实施大撤退的船只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傍晚时分,当轮船从上游开来,快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轮船上的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拖着驳船的拖轮已经驶近。轮船刚刚抛锚,驳船已经靠到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

40 天过去了,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走运了 2/3。又过了 20 天,江水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宜昌南北岸各码头的器材都看不见了。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完成了。当日寇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这里已是一座空城。

刘重来教授表示,这是一次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大转移,国内主要的军工设备、器材和人员撤退到大后方,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重建起新的工业基地,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强后盾。

能源产业中如河南的中福煤矿公司,它从豫北撤退到宜昌后,没有力量继续后撤,眼看就要落入敌手,民生公司主动助其将全部设备、器材和人员运到重庆,与北碚的天府煤矿公司合并。后来,这个煤矿成为战时重庆最重要的煤炭供应基地,供应了重庆一半以上的燃料。

在工业上有上海的大鑫炼钢厂、汉口的周恒顺机器厂,它们撤到宜昌后都再无力搬迁,也是在民生公司注入一半投资后,不仅顺利搬到重庆,还成了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企业。

还有从常州搬出的大成纺织厂,由于仓促撤退,只搬出了织布机,在卢作孚的积极促成下迁到北碚,与三峡染织厂合并,成为后方最大的织布厂。

这些企业后来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然而,其大撤退的英勇悲壮更甚于后来的欧洲战场敦刻尔克大撤退。史学家指



民生公司成立大会

出,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宜昌大撤退是由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为主要力量创造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为抵抗日寇,民生轮船公司付出了重大牺牲。据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回忆,1941 年 8 月时年 18 岁的他准备乘“民俗”轮入川,后改变行程下船回家。不久,他得到消息——从巴东运送抗日伤兵及旅客入川的“民俗”轮,驶至青石洞时被 7 架日机轮番轰炸,牺牲船员 70 人、伤兵 160 人、旅客 20 人,轮船被炸沉。统计资料显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有 16 艘船舶被炸沉,69 艘船舶被炸坏,117 名员工牺牲,76 名员工伤残。

1939 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民生公司参与宜昌撤退的轮船,并授予卢作孚一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1980 年,党中央

《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里这样写道:“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新闻链接

敦刻尔克大撤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次成功大撤退。1940 年 5 月,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军闪电战的快速攻势下崩溃后,英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的港口城市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撤退行动,短短时间内以各种船只撤出高达 40 万人的战斗部队回英国,避免了被全歼的危险,为后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战略大反攻积蓄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王雷

日本侵略造成中国巨大损失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了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国和重要牺牲国,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经济发展损失既包括经济损失,如直接的经济损失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也包括如经济发展机会的丧失,经济发展基础的毁灭,经济发展动力的削弱,经济发展能力的剥夺,经济发展劳力的减少,经济发展储蓄的贬兑,经济发展物质的短缺。总之,经济发展损失是指对经济体施加的破坏经济内生性活动的损坏和破坏。

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经济发展损失是惊人的,也是难以计量的。人口损失造成的后果更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和三光政策,空袭战、阵地战、细菌战,无所不用其极。1931-1945 年造成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损失,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动荡破败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损失更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注:本文所取数据以 1949 年为标准)。

1931 年中国人口有 5.8 亿,到 1945 年中国人口是 5.4 亿,中国人口静态损失 4000 万。中国在 1931 年时,人口出生率为 39‰,死亡率为 28‰,净增率是 11‰,那么 14 年间,如果没有日本法西斯强加的战争破坏,此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量理应为:0.9594 亿。

也就是说在战争机器和杀人恶魔横行的血雨腥风下,中国减少正常发展环境下的出生人口为 9594 万,如果加上香港和台湾的人口损失肯定超过 1 亿人口的正常增长损失。

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以上,间接经济损失 5000 亿美元以上,按 1949 年市值标准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人民币市值,则损失 3666 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从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的计算中可知,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所积聚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果丧失殆尽。 (论文摘)

电信局打来电话:日本投降啦!

成都民众彻夜狂欢庆胜利

自发组织了成都市第一支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队伍,欢快地向春熙路、盐市口走去。

到达春熙路时,这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游行归来已是晚上 10 点过。当晚,整个蓉城街头,成了欢乐的海洋。

“还记得抗战胜利日那晚 7 点过,我正在智育电影院(后来的红旗剧场)看《出水芙蓉》。电影放到中途,突然断片‘打破板’(即放幻灯片),上面写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据当年编发日本投降号外的舒世荣老人回忆,电影院里顿时沸腾起来,人们顾不上看电影,立刻涌上街头,争相转告抗战胜利的消息。

舒世荣急忙赶回报馆,编发这一特大新闻稿件。第二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重要消息,以格外醒目的“出号字”(即超出特大号的字号)出现在《成都快报》的头版头条上。

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成都的一些民间组织于 1945 年 8 月 16 日发起庆祝大会,

为坚持长期对日作战打下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中国军工建奇功

20 世纪初中期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就连最简单的铁钉都被叫作洋钉,顾名思义是从海外进口的。而军事工业是整个工业系统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各地的割据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陆续建成了一些兵工厂,能够生产一些武器装备。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兵工厂有 14 家,其中在沿海地区的就占了一半,在优势日军的进攻下,这些兵工厂所在地很快就将沦陷。所以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就立即决定将设在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沿海地区的兵工厂内迁。

正确的战略决策——内迁

1937 年 12 月南京陷落后,日军溯长江而上,兵锋直指武汉。1938 年 6 月,日军逼近马当防线,武汉告急,于是内迁至武汉的兵工厂,还没安定下来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搬迁,这回的目的地是西南、西北地区,主要是重庆地区。1937 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 46.8 平方公里,人口也才只有 40 余万。1939 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并被定为战时首都,辖区扩大到 300 平方公里。就是在这 3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先后建起了 10 多家兵工厂,员工总数达到 8 万,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军工重地。

选择以重庆为军工基地是相当明智的决策,这是由重庆的地理条件和战略地位所

决定的,处在山区,便于隐蔽;两江环绕,水运交通便利。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军工生产的基地。

截至 1940 年,军工企业的大内迁基本完成。内迁到重庆的兵工厂,基本上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以便于充分利用江河进行水运。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 2 工厂(抗战后撤销)、第 50 工厂(现望江厂)、第 10 工厂(现江陵厂)、第 30 工厂(抗战后撤销)、第 21 工厂(现长安厂)、第 20 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 11 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 24 工厂(现特殊钢厂)、第 25 工厂(现嘉陵厂)等。

在艰苦条件下保障生产

通过军工企业的大内迁,也给了国民政府对原来由各地军阀控制的兵工厂进行统一整顿、统一管理的契机。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各地兵工厂各自为政、军械制式混乱,往往既生产炮,又生产枪,还生产弹药,但是产品质量不高,产量也不大。内迁后,兵工署开始统一制定械弹制式,并确定每个厂集中生产一种或数个产品,以集中有限的力量发挥最大的作用。

除了到重庆的以外,还有一些兵工厂也



抗战时期位于重庆的钢铁厂



1944年重庆第21兵工厂生产的120毫米迫击炮

迁到了西南大后方,从而建立起了大后方的军事工业。1940 年以后,国民政府又在大后方新建了 8 个兵工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军工体系。而且为了保密起见,兵工署还下令各厂厂名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冠以所在地地名,而一律称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兵工厂。

兵工厂的内迁对中国抗战时期的军工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 年和 1938 年,国民政府总共只生产出了步枪 123330 支,轻机枪 3600 余挺,重机枪 700 挺,迫击炮 1700 余门及部分枪弹。但是,迁移到重庆的兵工厂从 1938 年相继复工至 1945 年抗战胜利为止,共产各种枪弹 8.54 亿发,步枪 29.34 万支,轻机枪 1.17 万挺,重机枪 1.8 万挺,各种火炮 1.4 万门,各种炮弹 598 万发。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国军共进行大规模会战 22 次,重要战斗 1117 次,其他战斗 38931 次。激烈的作战带来的武器弹药消耗也是非常巨大的,尤以 1939 年以及大反攻时的 1945 年损耗最大。另外,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也曾得到重庆兵工厂提供的武器弹药。

为坚持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战时重新崛起的中国军工业虽不能完全满足作战的需要,但是对中国军队能够坚持长期抗战,作用和贡献是非常巨大的。至少为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武器弹药保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兵工厂,在外援基本断绝的情况下,即使想要坚持作战,也没有可靠的武器弹药保障,真正是有心无力了。

正是看到了军工生产对于坚持抗战的重大价值,所以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兵工厂的正常运作,可谓是举全国之财力。以 1939 年度国民政府的岁入支出为例,赤字 20.57 亿元,其中兵工署经费就占了该年度国库总收入 的 32.38%。正是几乎不惜代价的付出,才给大后方的兵工业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而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战争环境下,各方面的条件也是相当艰苦,有日军不断的空袭,有各种生活物资的匮乏,但是数万军工行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却依然坚持下来,并为前方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因此,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丝毫不逊色于在前方作战的将士们,一样值得我们后人的纪念和敬仰。

(渝文)